

1104



第 57 期



海宁文史资料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13/0605

谈迁《国榷》研究三题

钱茂伟

研究谈迁及其《国榷》，始于吴晗。他的《谈迁和〈国榷〉》一文，直接奠定了谈氏史学研究的基础，可惜的是，吴晗以后的研究，进展不大，都是些介绍性或重复性的文章，新意不多，更毋庸说有全面使用谈氏作品研究谈氏的文章。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国榷》一书作些新的探索。

一、《国榷》诞生的学术背景

谈迁决心作《国榷》，直接的因素是他觉得陈建的《通纪》水平太差。天启元年，母亲死，谈迁守丧在家。按那时规矩，守丧期间不能外出，但可以在家读书。他读了《通纪》一书，觉得很满意，“陋之”，于是“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卷百”^①。这点，吴晗等人在文章中提到了，但因不熟悉《通纪》，所以未能展开，显得孤立，人们读后仍搞不清它的学术背景。我以为，谈迁作《国榷》，应该把它放到晚明以续补《通纪》为主要形式的编年体明史编撰风中去理解。

明以继宋自居，但官修史书事业相当落后，“学士家犹逊言之”，洪武至正德间，竟没有一部象样的当代史著作，只有一些杂史、笔记、名臣录，“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记载或失之略”^②，值嘉靖年间才逐步出现了第一批明史著作。成于嘉靖三十四年的《通纪》是第一部编年体明通史著作。该书全称《皇明资治通纪》，凡42卷，包括前编《皇明启运录》8卷，后编《皇明历朝资治通纪》34卷。作者是东莞人陈建（1497～1567）。这部被推为“本朝典故权舆”^③的明史著作，曾整整影响了晚明几代人，几成了明编年史的代名词。此书诞生于明中叶，对晚明人来说，有两大不足，一是没有参阅明列圣实录，二是下限仅及正德。万历以后，明列圣实录逐渐传播到民间，新史料增加了，人们眼界高了，相应地对明史的撰作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有适应新时代的明史著作。晚明人改写当代编年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续补《通纪》，即补写《通纪》，合刻于后世。今传世的沈国元《皇明从信录》、《两朝从信录》，陈龙可《皇明十六朝广汇纪》，高汝栻的《皇明法传录》，江旭奇的《通纪集要》等多为续订之作^④。二是在《通纪》的影响

下,另起炉灶,重新编一部编年史。谈迁的《国榷》、薛应旂的《宪章录》、冯复京的《明右史略》、张铨的《国史纪闻》等,都属此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谈迁初作《国榷》,虽是在晚明明列圣实录广为传播的情况下进行的,但他并没有参阅过实录,这点,他本人及别人都曾谈到过。喻应益称“乃集海盐、武进、丰城、太仓、临朐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曰《国榷》。”^⑤谈迁本人也称“尝窥国朝编年,如海盐、丰城、武进、临朐,觊附其后,博考百氏,类辑诸家。”^⑥可见,谈迁开始作《国榷》,主要是“类辑”排比考订各种“野史”而成的,并未有机会参阅实录,这和张铨作《国史纪闻》有类似之处。张氏作《国史纪闻》,时值在山西老家等待分配工作之时,也无缘读到实录,仅“悉取诸书,置之几案,参校异同,披沙拣金,集狐择腋”^⑦而已。

总之,《国榷》是在晚明以续补《通纪》为特色的编年史撰写热潮中诞生的一部明史著作。其目的是为了成就一部皇明信史。

二、《国榷》一书的体例特点

关于《国榷》一书的体例特点,今人谈到了,但似乎没有抓到点子上。我以为,和别的编年史相比,《国榷》体例有两点是值留意的:

第一,按日记录,内容详赡。一般的编年史著,多及月份,“线条”比较粗;但《国榷》不一样,它是按日记载人和事的。所以,该书又称《皇明日记》^⑧。这点,和谈氏受实录体例影响有关。现存《国榷》,可以说是《明实录》的缩写本。今人如欲使用《明实录》材料,而又嫌实录部头太大,检索不便,那么,不妨可以先读一下《国榷》,然后按图索骥,到实录中找有关材料。当然,《国榷》出于《明实录》,而甚于《明实录》,不能完全等量齐观。

第二,间附按语,亦评亦辨。

《国榷》又称《国史榷》,简称《史榷》^⑨,榷者,商榷也,“义无所短长”^⑩。谈迁作《国榷》,受考信派影响很深,十分重视史料的考信工作。他认为“月旦一时,是非千古”^⑪。所以,“若亥豕之讹,雌黄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于百祀之下”^⑫。同时,他又受陈建《通纪》多按语影响。反映到《国榷》一书中,便是插进了相当多的按语。这些按语,有谈迁本人写的,也有别的史家写的。在按语中,或评或辨,内容很丰富,非常值得今人作些研究。可惜的是,吴晗、罗仲辉等人尚不暇顾及。

此外,《国榷》在叙述上,文笔简练,敢于直书,也是值得顺便提一提的。《义

例》称“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毋靡，宁塞毋猥，宁裁毋赘”。黄宗羲也说他“按实编年，不炫文彩”³。这些，是符合《国榷》实际的。特别是，谈迁在清朝立国十几年的情况下，仍敢于无忌讳地写明清间这段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可信的建州史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这和顺治前期政治气氛尚宽松也有一定关联，不完全取决于谈迁的胆识。

三、《国榷》成功的因素所在

明末清初，史家曾写过多部编年体明史著作，光通述有明一代之事的，除了《国榷》外，就还有韦人凤的《通鉴续编》。此书又称《明纪》，凡132卷，张衡均所得抄本有残缺。该书很有特色，全书分四集，以高、建、成、仁、宣为一集，“大正始也”；英、景、宪为一集，“志变也”；孝、武、世、穆为一集，“盛中兴也”；神、光、熹、祯为一集，“志乱也”⁴。很注重盛衰规律的探讨。可惜该书仅残存几册。《国榷》是现存第一部最完整的编年体明史著作，是一部“可以信今而传后”⁵的高质量明史著作，即便到今天，仍是治明史者的常备参考书，第二稿《国榷》之所以比第一稿水准高，主要是下面一些因素促成的：

第一作史方法有了较大的改进。如前所述，谈迁第一次写《国榷》时，参考的是各种私修明史著作，多为二手资料，所以可以想象，质量不会太高。当然，据邸报等材料补写的崇祯朝另当别论。到顺治初年第二次写《国榷》时，他参考了《明实录》。他从嘉善钱氏处，雇人抄录了《明实录》，不全，“为主书删其半”⁶。后来，又向武功霍达借阅了《万历实录》。他认为“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质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⁷，所以，须国史、“野史”互参。由于谈氏第二次作《国榷》时，能“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⁸，所以，《国榷》一书材料的可信性大大加强了。

第二是材料增加了。他第一次作《国榷》时，晚明其他史家所写的明史著作尚未刊刻于世，所以，参考资料不多。到他第二次作《国榷》时，资料条件大为改善。他除参考了明列圣实录邸抄外，还有机会读到了新出版的《史概》、《名山藏》、《嘉靖以来注略》、《国朝公卿部院大臣年表》等私修明史著作。还有不少抄本，如霍达的《西事》、刘若愚的《酌中志》、孙承泽的《崇祯事迹》、《四朝人物传》、吴伟业的《绥寇纪略》等等。特别是他晚年出游北方，访问明故公侯的门客、降臣、宦官、皇室等，搜集到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丰富的资料，为《国榷》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第三是得到了别人的审订。谈氏晚年有机会到北京住了二、三年,和北京的一些名流,尤其是吴伟业、曹溶、霍达有较多的来往。谈迁除了向他们借阅资料外,还经常把誊抄好的稿子拿给吴伟业、霍达等人审阅。谈氏认为“史事更贵搜订”²²,所以,主动要求吴氏等人帮他审定稿子。吴、霍二氏确也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北游录·纪卹》甲午(1654)二月甲申,“仍访吴太史,语移时,晚招饮。以《国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订,各有闻相证也。”九月丙午,“霍大理征余近录。”在给霍达的信中,谈氏也说“幸逢鸿匠,大加绳削”²³。“史非一手一足之力”²⁴,须有别人的帮忙,《国榷》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理论。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谈迁因第一稿被人偷去了,于是不得不另起炉灶,改写第二稿,结果第二稿比第一稿还成功,这是谈迁始料不及的。

注:

①⑩《国榷·义例》

②⑤喻应益《国榷·序》

③沈国元《皇明从信录·总例》

④详参拙作《陈建〈通纪〉及其续补诸家略考》,《文献》1993年3期

⑥谈迁《上钱塞庵相国书》 中华书局本《国榷》附录

⑦张铨《国史纪闻·自序》

⑧⑪钱朝玮《谈孺木先生传》,《国榷》附录

⑨张次仲《张侍御先生遗集》卷8《纪录》,见《国榷》附录

⑬《国榷·义例》

⑭⑯黄宗羲《谈孺木墓表》,《国榷》附录

⑮韦人凤《通鉴续编序》

⑰吴騫《枣林诗集序》引谈迁语

⑱《北游录·纪卹》

⑲《国榷·义例》

⑳《北游录·纪文·上吴骏公太史书》

㉑㉒《北游录·纪文·上霍鲁斋大理书》

(作者系宁波师院历史文化系讲师)

地缘文化史料中的谈迁

——纪念谈迁诞辰 400 周年

高 健 行

(一) 灭绝了的家园故土

枣林是谈迁的故土。然而这片乡土早在元代已淹没在钱塘江中。历史地理的事实告诉我们：宋代以来是海塘失修、潮汛最活跃的时期。原先钱塘江故道流经萧山的龛山与海宁的赭山之间，两山对峙，谓之“海门”。后来海潮趋北，江流改道，本属海宁的北岸赭山、文堂山、河庄山、蜀山等地遂变为江的南岸。因此，在清嘉庆十八年划定行政区域时，以江为界，上述诸地已并入萧山县界，海宁版图竟缩地四五十里。

谈迁自署江左遗民，在《枣林杂俎》题跋中说：“……系枣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难，自汴徙于杭者四传。德祐末，避兵徙盐官之枣林。今未四百祀，又并于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可避哉！求桃源而无从，庶以枣林老耳。书从地，不忘本也。”其实，谈迁居于麻泾港西，据张宗祥先生考据，且一度移居硖石西山麓也是园。其时正是甲申国变之后。他心目中的国家（明朝）已经毁灭，便以绝灭于海潮中的原枣林村为隐喻，也借以追念祖先居处繁衍的北方大地。这位以江左遗民自居的老人，“书从地，不忘本也”。其含义是一种深刻的悲痛，流露于笔端下正是历代史家最看重的“春秋笔法”。

然而，谈迁生活的杭嘉湖广阔平川，仍是养育培植他厚实浓重史学思想的地域；他著作等身的巨大学术成果，脱离不开地缘文化背景。他正是在这方水土中植根开花结果的。吴晗的名著《谈迁和国榷》，列举了一百二十三位谈氏参考过的著作人姓名。此中有很多隶属杭嘉湖地区，以及从这个地域辐射开去，包括苏南、安徽、浙东乃至赣、鲁、闽——正好是当代地区划片中的华东行政区。吴晗还特别强调：“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盐郑晓的《吾学编》、《今言》；丰城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太仓王世贞的《弁山堂别集》；武进薛应旂的《宪章录》……”又着重指出：“谈迁携稿北游时，来往最多的几个人是太仓吴伟业骏公，秀水曹溶秋壑……”

历史上浙江文人辈出，有人借助《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其他一些文史类书，凡姓名见诸各文史条目或系书，合计约六千八百五十一人。其间浙江就占一千一百七十名左右，为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到明清交会之际，更因杭嘉湖地带农商经济繁荣，加之沿海市贸海舶活跃，社会经济文化渐趋繁盛。出现一大批全国著名的人物。如陈与郊、冯梦龙、凌濛初、张岱、潘季驯、刘宗周、戚继光、张煌言、李渔、董说、毛奇龄、朱彝尊、黄宗羲、吕留良、洪升、万斯同、查慎行等等，各领风骚。这些人继承、创导、发展了一种浓烈的文化氛围。

自从1594年(万历癸巳)谈迁诞生，便有数十位与他同时代、或稍后文名卓著的人物纷纷出世。而且大都忠于故国，具有民族气节。如谈迁四岁时，那位《石匱书》、《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便降生(1679年卒)在海宁对江的山阴。比谈迁小八岁，后以《罪惟录》与谈氏齐名的同邑查继佐(伊璜，号东山先生1676年卒)。生于1601年，我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余姚黄宗羲(梨洲，1695年卒)。以及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的太仓吴伟业，桐乡张杨园(履祥字考夫，1674年卒)同岁诞生。1611年，如皋那位明亡不仕的冒襄(辟疆，1693年卒)生。同年，著名戏曲家同邑陈与郊(禺阳)卒。1613年桐乡孙子度和《水浒后传》作者乌程陈忱诞生。1615年黄宗炎(晦木)生。归有光曾孙、抗清失败后借装亡命的归庄，和亭林著名思想家顾炎武(1682年卒)同岁诞生。1616年客籍南京的《板桥杂记》作者余怀生。1618年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1655年卒)诞生。宣城施闰章(愚山)、泰州吴嘉纪、参修明史的长洲尤侗均于是年诞生。1619年思想家王夫之(船山)诞生。1620年南明大臣张煌言(苍水)、乌程董说、明亡不仕的钱塘毛先舒同年出生。至1621年，谈迁二十八岁，为《国榷》史稿草创之始。回顾一下，从童年至此，全包围在这些历史名人群星灿烂的光辉之中。

(二) 学业精进世日艰

上文引摘这许多历史名人包括学者、思想家、抗清义士和明末遗民，都是民族矛盾激烈时代的代表人物，先后出现在明清易代的历史舞台上。谈迁的史学思想，在这种宏观的历史框架中形成，是有着极良好的条件的。尤其古代社会讯息传播速率缓慢，地域的临近，便成了人们彼此思想交流的极大有利因素。对于年轻的谈迁，这些近距离内人物思想的相互辐射作用，必定是强烈的。也是完善学业、充实自身必不可少的文化养料。因为，谁也不能设想，一个原始人，能在洪

荒世界中创作出巨篇宏论来的。

谈迁在三十岁后，父亲和生母相继去世，从此他自立于世，作为真正意义上一个环顾八方、开始创基立业的年青学者，从学问中拓创自己的事业。他在《国榷》义例中写道：“天启辛酉值内艰。读陈建通纪，陋之。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卷百。”从这条谈迁自己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从辛酉开始，在这特定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中，谈迁六个寒暑的光阴、以一个年青学子充沛的精力，完成了《国榷》初稿。那种兴奋不已、踌躇满志之情可以想见，也稍稍表露于其自序之中。然而，社会生活的残酷事实，并不符合他的心境。朱明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朝政腐败，世风日下。锦衣卫特务横行，阉党霸权，党人朝野啸聚，百姓苦不堪言，灾民起义的烽火不断。谈迁叹谓：“……今未四百祀，又并于德祐”他把明朝的衰颓，比拟如宋末德祐的沦丧景象而感慨万千！

（三）彪炳千秋肩重任

谈迁撰成史稿之初，到甲申国变十八年间已历尽沧桑，深感历史责任重大。他纂辑史稿再也不是一个文化人的个人行为。他自觉地把崇祯和南明弘光两朝续补进去。而且文字比重，约占全稿六分之一，明显地丰富了著录的内涵。当然，这也与其亲历那动荡时代有关。不幸的是那个战乱的年月，也直接威胁到谈迁那部史稿的安全。终于，“丁亥八月盗胙其篋。”廿五六年的心血失之一旦。这个打击是够惨重的。但他毫不气馁。认为书稿“虽尽失之，未敢废也。”这个“敢”字，写尽了他的历史责任心。为什么不敢？对谁不敢？这就只有理解成谈迁不敢不对历史、对后世有个真实的记录，有个认真的交待。至此时，谈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已十分成熟。

谈迁所处的历史环境，除了上节文字所录诸多历史名人与他同时成长外，还有许多在文史社会学科范畴及社会生活斗争之中，又将起作用的新一代人物，也纷纷来到人世。如吕留良（1629）、朱彝尊、陆稼书（1630）、夏完淳、吴太冲（1631）、吴农祥（1632）、吴之振（1640）、陈说（1642）等等。总而言之，在海宁周遭的知识分子活动频繁，且又有许多精英降生。安阳许三礼（西山）任海宁知县时，并多次礼聘黄宗羲前来海宁讲学，这对于促进海宁学术思想的发展，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也表明了：作为谈迁生活时代背景的地缘文化更其加强了。

(四) 冰毫汗茧终成功

1985年出版的《罪惟录》前言中指出：“清初由个人力量撰写的有明一代断代史，有鄞县万斯同的《明史稿》，海宁谈迁的《国榷》，山阴张岱的《石匱藏书》，以及查继佐的这部《罪惟录》。这些书的作者都是浙江人。以后的浙东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在学术上更居于重要地位。”那么，这中间，谈迁不仅在时间上属于首位，而且在纯客观性方面，也明显优于他著。万斯同参与官修史而受到政治干扰，查继佐险些被卷入庄廷铨史案而不能不有所顾忌。

从《国榷》初稿亡失之后，谈迁出于历史重任，“未敢废”置未竟之大业，从新执笔起稿，“遂走百里之外，遍攻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櫛李沈氏、武塘钱氏稍略焉。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国榷·义例》）。他自己觉得最终能圆满完成自己的志愿是珍视为愚公移山式“守株”“刻剑”的苦功夫之成就。在事业最后冲刺中，除了北游时，来往最多的几个人，如太仓吴伟业，秀水曹溶等人。都是得力于杭嘉湖地区同乡人缘关系，或得到他们的重视推介，而取得外乡人的帮助。所以说，《国榷》的成书，始终脱离不开他故乡的那片热土，直到北游归来，至清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谈迁长辞人间。

(五) 《国榷》余绪及《罪惟录》

谈迁故世之后，他同时代人，或者在他生命最后年月出生的下一代，仍然在杭嘉湖这片热土上，有声有色地开展着抗清、反清，从事浴血争斗。这些血淋淋的历史，实际上早已又有人不动声色地记录着。此中最有成效的，莫过于同邑查继佐，从甲申起就悄悄著录。乡贤张宗祥1955年为《国榷》所写的题记即有详细材料：“……《国榷》之成，意者其在顺治十年前后乎？自明崇祯甲申至清康熙壬子，查东山先生有《罪惟录》之纂修。（此据东山《罪惟录》自序。若沈仲方所撰《东山年谱》，则云《罪惟录》始于乙未，终于乙卯，即自清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十五年也。）二先生行辈相同。居又同里。（谈先生居硖石紫薇山西南麓也是园，查先生自粤归浙，辟敬修堂于杭州，又筑幽居于硖石沈山东麓万石窝。盖紫薇山即西山，沈山即东山，故查氏暮年以此山为号也。）所不同者，查豪放结客，谈抱朴守约耳。何以二人若不相识，各无一语及之也。意者谈氏在庄氏史狱之前早已谢

世；而查氏既经史狱，幽囚二百日之后，虽奋笔成书，不欲表暴于世。深闭固拒，以史为讳。即知谈氏书，亦惟有铁函深井，藏之已耳，敢引以贾祸耶！”也许张宗祥先生说得有些道理。反清复明的思想，“严夷夏之大防”的学术观点，在杭嘉湖一带知识分子中间虽很普遍，也有好些结社、会文的举动，但涉及到真正修史具体问题，总是十分谨慎小心的。应该说，谈迁生前，政治混乱，相对的思想钳制统治，尚多有漏洞，文网未密，不太受统治者关注。到了谈迁逝世之后，接二连三的文字狱大案，发生在谈迁曾经脚踏的这片江南水乡热土，成了历史上最黑暗年月之一。政治迫害接连不断，文网大炽。1662年南浔庄廷铨《明史》案发，1726年查嗣庭科场案起，1728年吕留良文字狱兴。无一不惨遭清庭“戮尸枭示”，“剖棺锉骨”，“满门抄斩”等灭族之灾。都是因为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唯恐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世知道，影响他们的万世统治大业。当然，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从秦之焚书坑儒到“文革”浩劫，谁都难以篡改历史。《国榷》之所以能顺利成稿，虽曾遭盗贼之劫，倒并未遭书稿检查和落入文字狱，实在是令后人庆幸的。更使得谈迁本人，能在浓烈的乡土文化的土壤中顺利成长，在地缘文化背景中建树他的功业。另一方面，他身后的书稿得以保存下来，也都有赖于爱国乡贤们的冒死珍藏。当代学者谢国桢在《晚明史籍考》中说：“今谈书……传本尚夥，良由海昌人士留意前辈撰著，互相缮写流布不绝。”再加谈迁本人既非名门望族，又僻居乡隅，所遗文物亦不多，现存资料其实也都是些有心人传抄转录，有意识地整理出相关地缘文化资料，以便从其同时代人物史料中，寻求线索，为第二层次的深入研究带来方便。其实世上一切人物的创造性活动，均受自身的本土性制约和营养。这便是广义的人类阶级层次的“地质因素”——也即地缘文化的实质。所以若要对谈迁所处明清交会之际，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便极有必要对这位历史学家的地缘文化背景，有所了解。本文祈求抛砖引玉之意亦即在此。

私家史笔 《国榷》是奇葩

南田秧

谈迁(1594—1657)是明代万历年间出生在海宁的一个穷书生。原名以训，字观若。祖居本在海宁城外枣林村(现已为潮涌侵湮)。明亡以后，他更名迁，字孺木。享年六十四岁，以老秀才终其一生。

谈迁自幼好学，无书不读。但家境清贫，难求温饱，要专心读书是很难想象

的，但他始终不懈，孜孜以求。因家乏藏书，又无钱可供购置，只好四出求人借读，有时还得远走他乡，徒步往来，求书于藏书之家，不分寒暑。读书凡遇佳章，每手自摘录，如此胼手胝足，不以为苦，在勤读笔耕的生活中直熬到两鬓染霜。

谈迁一生著作，以五百万言的编年体明史《国榷》最为有名，史料价值很高，已为世所公认；尤以涉及自明代万历以后和金的史实记载更为他书所不及，也是他呕心沥血的不朽之作。当他二十九岁，因遭母丧，守制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发现其中错漏甚多，他就此立下了宏愿，要编纂一部符合明代历史的编年史留给后代。

明儒黄宗羲在为谈迁撰的《墓表》中记述说：“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君之有是书也（指《国榷》），思欲窃之以为己有”。可知《国榷》成书，很快为世所重，大有招致沽名者攘夺之虑，其有居心叵测者企图假书以传。《墓表》中又说到：“君家徒四壁立，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那时谈迁已经五十三岁，突然书稿被窃，经此一场飞来横祸，数十年心血尽付东流。但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在浩劫悲愤之余，仍能镇静自若，沉毅果决地重整旗鼓，再度重写以期复成。

自清兵入关，明朝灭亡，际此国破家亡的关头，天下纷纷。谈迁“遂走百里外，遍考群籍。”不改初衷，一往直前，周旋士林间，苦心坚持搜集资料，稽考史实。可谓“半夜灯火五更鸡”，日夜心劳案头。此外，又不断咨询前辈，登门就教，不耻下问，以勘漏补阙，改错纠偏，丝毫不苟。

谈迁秉私家史笔，能做到如司马迁《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徐坚首次 在《初学记》提出：“方志直文”的理论命题，并引《魏书》王肃对明帝说的：“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叙事有良史之才。”证诸历代文人修志，大多数不能做到“方志直文”的要求。谈迁深怀“明灭，史不灭”的朴素真诚的念头，一片赤心笔秉明史的写作，完成《国榷》一书，且取材宏富，可补史传之不足。他在撰写过程中几经困难和种种冷遇，都未计较在心，只知兢兢业业“一往情深”，日积月累，终成巨篇。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顽强的拼搏精神，表现了一个刻苦自励的爱国学者的崇高品质和气度，堪为后代楷模。

谈迁对待卷帙浩繁的明史，执着于“六经折衷”（指中庸）的观点，斟酌史料均一一加以查考，细心论证，比较又旁取博采，客观可靠。《国榷》成书，曾参考了一百数十家的有名著述，反复推敲、校正，并经六次修改，终于一手完成了一百

另八卷的扛鼎巨作。

接着，他于六十岁高龄时，携带定稿远涉北京，实地考察明朝遗迹，旁搜遗闻以及有关的史实，在旅途劳顿、资用匮乏的困难情况下，多方访问、探询知名人士以及明末遗老、皇亲、宦官、降臣等不同人物，亦曾为此勉强做了许多年达官贵人的记室幕友，其间尤其是北游、西游期间，往返千里，风餐露宿，不知吃了多少苦。为了进一步修订《国榷》，谈迁竟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今年是谈迁诞辰四百周年。缅怀先贤事迹，使我们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教育和鼓舞。

谈 迁 年 谱 (初 稿)

陈伯良编

谈氏世汴人。其先出自郑子。宋建炎初，迪功郎肇以靖康之难，自汴南渡，徙临安盐桥。德祐末徙盐官枣林村，其地以产盐官枣著名，元时陷于海。寻徙麻泾河西。世耕读。

祖龙泉，生三子。

父于庭（1548——1623），字扬甫，号存一，为龙泉公季子。郡诸生。著有《容膝轩稿》二卷。（见康熙《海宁县志》暨清末民初《海宁州志稿》艺文志）元配沈氏，生子漠（吾志），继娶俞氏，生子迁（以训）。

谈迁，初名以训，号射父，继字孺木，号观若。明邑廩生。别署亦左史氏、江左遗民。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十月十二日（1594. 11. 23），卒於清顺治十四年丁酉十二月十一日（1658. 1. 14）。享年六十四岁。

妻俞氏，生三子：朴、祺、祉。祺为县学生，曾参与编纂邑令许三礼主修的康熙《海宁县志》，并请黄宗羲为其父作《谈君墓表》。长女早卒。（见《哭女》一诗。载《枣林诗集》）

（以上并见《皇考存一府君序》，载《枣林集》及朱一是《谈孺木先生墓志铭》，载《为可堂文集》卷二十八，又《国榷》附录）

明亡之时，相国高弘图绝粒而死。临终前，曾将其幼子托付给谈迁。

（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及清代海宁籍著名学者吴騄的《愚谷文存·枣林杂俎跋》）

谈迁墓在海宁麻泾港西、故宅之东偏。

(见朱一是《谈孺木先生墓志铭》。《海宁州志稿》引《硇川续志补》，称其墓在麻泾港东南，恐有误。)

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 一岁

十月十二日生于海宁县麻泾河(今海宁市麻泾港)西之故居。属马桥镇谈浜。

(见朱一是《谈孺木先生墓志铭》)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年) 十五岁

补弟子员。喜古文辞。

(见谈迁《海昌外志·风俗》：“予舞象时补诸生。”朱一是《谈孺木先生墓志铭》云：“……幼颖异，舞象补弟子员。”钱朝玮《谈孺木先生传》作：“未弱冠补弟子员。”见谈迁《枣林诗集》附录及《国榷》铅印本附录。按：两说微有差异，其事当在十五岁后、二十岁前)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年) 二十五岁

是岁夏，赴都应试。

(见谈迁《枣林杂俎·梦卜》条)

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 二十八岁

始著《国榷》。在家读陈建所著《皇明通纪》，深感其中谬误之多，遂着意搜集史料，决心自编《明史》。从此时起，“破屋颓垣，凭几著书。”

(见《国榷·义例》。又见《上钱塞庵相国书》：“……霜毫冰研，忘饥废寝者屹屹二十六年”。按：书稿被窃，事在清顺治丙戌，即公元1646年)

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 三十岁

时客橈李(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南，亦曾为嘉兴别称)。

(见《北游录·自序》)

九月六日 父谈于庭卒。谈迁时方佣书橈李。

(见《枣林集·皇考存一府君序》：“呜呼！先君之弃人世也，不肖迁方佣书橈李，痛不及诀，仅视含焉……。生嘉靖戊申六月十九，年七十六。卒九月六日。”按：嘉靖戊申为公元1548年，按旧时习俗以虚龄推算，则卒时应为1623年)

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 三十一岁

母俞氏去世。

(见《枣林集·皇考存一府君序》：“天启甲子，继室俞孺人歿。”按：此处与《国榷·义例》：“天启辛酉，值内艰”有矛盾。其母卒年似以甲子为是。)

天启六年丙寅（1626年） 三十三岁

三月 为《国榷》作自序（此后又有增定）。

（见《国榷》自序及跋）

是年，客同邑（海宁）徐氏，与徐道力（元桀）连席。

（见《北游录·自序》）

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 三十五岁

七月二十三日 海宁潮溢决，深入平野二十里，漂溺人畜庐舍无算。

（见康熙《海宁县志》）

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 三十六岁

平潮赵维寰（无声）为海宁教谕，修纂邑志《宁志备考》，谈迁为县学生，以自纂《海昌外志》补，为是书参定者六人（朱道行、许令瑜、郭浚、吴维熊、徐而荐、谈以训）之一。此时谈迁尚用谈以训之名。

（见赵维寰《宁志备考》）

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 三十七岁

为赵维寰《宁志备考》作小引。

（见赵维寰《宁志备考》）

崇祯八年乙亥（1635年） 四十二岁

是岁，馆横山（原属海盐，今归海宁）张氏。

（见《枣林杂俎》）

夏四月 全家遭火灾。

（见《告土地神文》。载《枣林集》）

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 四十九岁

受知于阳城张慎言（藐山）、胶东高弘图（经斋）。二公者天下之望，相与为布衣交。

（见康熙《海宁县志》及朱一是《谈孺木先生墓志铭》）

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 五十岁

元旦 时客金陵。

（见《枣林诗稿·癸未元旦》注：“时客金陵。”）

崇祯十七年甲申 弘光元年 清顺治元年（1644年） 五十一岁

正月 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

正月既望 谈迁至金陵，为御史大夫张慎言祝寿。时高弘图、史可法亦在座。张语及谈迁博雅善于料事，建议高可聘为记室。

三月十八日 夜半，李自成破京师。明思宗（崇祯）自缢死。

四月 史可法、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初称监国，旋即帝位，年号弘光。

四月初 谈迁应聘入高弘图幕。时高入相，张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近与谈迁商议，经常连日交谈，直至夜半。由于谈迁对所参与谋画之事颇多远见卓识，不少意见均被采纳。

（见康熙《海宁县志》）

五月 谈迁参与迎銮。

（见《枣林诗稿·甲申五月迎銮》）

是月，清兵入京师。

是月，史可法奉命督师扬州。谈迁为史可法代作《史相国誓师文》。

（见《枣林集·史相国誓师文（代作）》。又，《国榷》在卷一百纪事后注云：“此下尚有史阁部檄文，而原本缺之，仅存一行，故不录”。此据浙江图书馆静得楼钞本《枣林集》补。）

是月，高弘图相国拟荐谈迁为中书，谈迁力辞，以至泣下。旋又荐入史馆，谈迁亦坚决辞谢，并谓：“余岂以国之不幸博一官耶！”高乃另荐宣城唐祖命、歙县方世鸣等人。

（见朱一是《谈孺木先生墓志铭》及《枣林诗稿·高相国拟荐中翰、泣谢四首》）

六月 马士英荐举阮大铖入阁，东林、复社人士群起反对。由于马、阮当权，肆意煽惑，明廷内部纷争又起。张慎言、高弘图等一心辅政，却为马、阮所嫉，诬称把持。福王亦宠信奸佞，亲小人，远贤臣，时事日非。谈迁力劝张、高辞官，免任误国之咎。

（以上见谈迁《国榷》及查继佐《罪惟录》）

八月 高弘图受命迎皇太后于广陵驿，谈迁亦陪同前往。

（见《北游录·记咏下》）

九月既望 题《枣林杂俎》。高弘图为《枣林杂俎》作序於白门公署。初，京师为李自成陷落时，光禄寺署丞高弘商被困城中。秋末，省其兄高弘图相国，备述京师陷落始末，谈迁为记录其事，作《金陵对泣录》。

（见查慎行《人海记》）

十月初六 大学士高弘图第四次上疏乞归，允之。临行时，谈迁虽久“事客舍，未尝乞丝发之赠”。

（见《谈迁入幕记》。载《国榷·附录》）

高弘图辞官南归，谈迁亦随之离去，两人同宿石城门。

(见《枣林诗稿·高相国解组同宿石城门》)

是年冬，高弘图僦居姑苏城隍庙之南。

(见《北游录》)

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 五十二岁

二月 谈迁至常熟。汲古阁主人毛晋(子晋)邀请高弘图至虎丘相叙，谈迁亦陪同前往，不久与高相别。

(见谈迁《北游录·纪程》)

是月，张慎言辞官乞归，适其孙泰茹自阳城来，因家乡未复，遂随之同徙宛陵(安徽宣城)。谈迁专程前往访谒，张命其孙向谈迁执弟子礼。

(见《枣林集·冢宰张藐山先生传》)

初，张慎言欲到海昌(即谈迁故乡海宁之古名)，称：“乔居非故交不可。”旋以家人苦远而止。

(见《枣林集·题冢宰张藐山先生手札》)

四月 清兵破扬州。明督师史可法殉难。清兵屠扬州。

五月 清兵渡长江。清多铎军至南京，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迎降。福王(弘光帝)为降清之刘良佐所俘(次年被杀)。明亡。

是月，高弘图闻警自姑苏至杭州之北关，已闻镇江陷。其时浙抚张秉贞口不言兵。总督张凤翔泊塘栖，高偕谈迁登其舟往谒，并语及谈迁可与计事，张接之并坐，相谈良久。

次日，高弘图与谈迁相偕渡过钱塘江，宿西陵。旋又一道返杭。知大势已去，共出西湖，宿净慈寺。据寺僧三昧告知，悉金陵已失陷，即于次晨再次渡江至西陵，乘舟冒雨至绍兴。

其时，刘宗周(念台)杜门不出，高弘图嘱谈迁往候，为守门人所拒。俄得刘手书，中有“故相(指高)为其难，某为其易。谈君不必远来，某何面目复见天下士乎！”等语(不久即绝食而死)。读后高弘图之意遂决。因知皇太后在杭，复渡江宿。林氏总督来，谈迁避之。

(见《枣林集·渡江记》)

五月二十九日 谈迁与高弘图告别钱塘，握手凄然。

(见《枣林集·哭高相国文》)

高弘图家本富有，明亡后荡然无存，仅一幼子相随。临死前，以幼子托谈迁，得免越东之难。

(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及吴騫《愚谷文存·枣林杂俎跋》)

六月 谈迁与原户部主事纪春晓(腾蛟)告别钱塘。

(见《北游录·纪卹上》)

谈迁归於海宁麻泾之西故宅。

清兵下苏杭，至海宁。

作《乙酉六月祭先人文》。

(见《枣林集》)

闰六月初四日 接高弘图短章。

(见《枣林集·哭高相国文》)

闰六月廿八日 高弘图绝粒死於绍兴寓宅(或作“高逃野寺中，绝粒而死”。谈迁至次年十月廿八日始闻噩耗。越三日，于十一月朔，设位南向哭祭之)。

(见《枣林集·哭高相国文》)

七月 海宁城破。

是年秋，张慎言客死宣城。(谈迁曾於顺治四年修书致张，但无音讯，至顺治六年七月间，友人徐君彦至，自燕传来消息，始知张已早卒，盖因战乱而音问阻隔也)。

(见《枣林集·冢宰张藐山先生传》及同书《遇哭张藐山先生文》)

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 五十三岁

丙戌，当以明经入贡，弃而游燕。

(见谈迁《海昌外志》。朱一是《谈孺木先生墓志铭》作：“丙戌明经次及，敝屣弃去。”钱朝玮《谈孺木先生传》称：“未弱冠补弟子员，食廩饩。遭鼎革，既脱去如敝屣。”按，据《枣林文集·谈迁入幕记》载：谈迁曾“受饩十有六年”)

是年 海宁东乡群盗啸聚。(按：谈迁故居亦在东乡)。

(见《海宁州志稿·杂志兵寇》)

五月 村盗方炽，曾入谈迁居处，因其家徒四壁，未掠。

七月八日 清兵入海宁城。义兵内溃，男女老幼遭屠戮者数以千计。谈迁故宅亦遭蹂躏。

八月初 迁家被掠。

(见《海昌外志》)

八月 《国榷》书稿被盗。时已锐意写作二十六年，其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

是年，作《哀柄臣辞》。(文前有谈迁自作小序云：“丙戌秋，贵阳马士英被诛。余闻而哀之，非哀其人，哀其事也”。(一说：“马士英卒於是年12月)。